

CDDC计划2007年出书, 稿件征集正在进行中, 欢迎踊跃投稿...



现代化意志的历史想像——对大陆近年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反思

时间: 2003-8-26 21:04:38 来源: 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 恒沙 阅读631次

近年来, 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一直是中国官民同乐的对象。据不完全统计, 仅近五年大陆就播出大型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三十多部, 其中清代剧就有十多部。尤其是最近两三年, 历史题材电视剧作为中央一套、八套黄金时段节目频频推出, 在全国创造了‘极高的收视律’, 《康熙王朝》、《太平天国》、《大明宫词》、《天下粮仓》、《大宅门》、《长征》、《激情燃烧的岁月》等等都带来了全国性的‘历史热’、‘怀旧热’。而刚刚播出的《走向共和》, 即便是在SARS困扰下的国民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一股‘晚清热’正方兴未艾。

值得注意的是, 电视剧已经成为目前国人重新想像历史的基本方式。对于普通观众来说, 他们对于历史的印象多半来自中小学历史课本, 由于应试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他们所知的历史相当粗糙, 得到的历史评价也比较简单甚至教条化。而细腻、生动、复杂的历史小说和电视剧, 以多姿多彩、鲜活生动的历史画卷提供了无限的想像空间, 更能满足人们求知和娱乐的需求。而且从唐浩明的《曾国藩》开始, 许多作品都在做‘翻案’文章, 因此, 这就更加容易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争论。另一方面, 用主控媒体(中央电视台)作为‘正统’历史观念来散播, 当代历史剧无疑起到的就不仅是普及历史知识、传播历史‘真实’的作用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历史剧是当代政治、教育、商业和娱乐的共同载体, 也是意识形态争夺的重要空间。因此, 考察这一现象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从历史的‘单一性’走向历史的‘复杂性’与‘相对性’

从整体上说, 我认为近年历史剧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创作倾向。首先一个重要突破就在于, 重新面对历史的复杂性,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表现更加相对化。不再用一种抽象的单一的评价标准来定位历史人物, 不管是曾国藩、雍正、乾隆、慈禧、李鸿章、袁世凯, 还是孙中山、洪秀全等等, 似乎和人们从教科书中得到的陈见和印象差别较大。可以看到, 这些人物不再是以往红黑分明的概念化‘符号’, 正面人物高大全、红光亮, 演员英俊威武; 反面人物则凶残暴戾、卑鄙无耻, 演员猥琐丑陋。而在人物塑造上多为‘灰色’形象与‘圆型人物’, 在‘正面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了许多缺憾, 而‘反面人物’则很难以简单的否定态度来下判断。比如曾国藩就不再仅是一个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杀人如麻的‘曾剃头’, 同时也是一个企图力挽狂澜、重振乾坤、励精图治的时代与民族的‘悲剧英雄’。

在历史事件的表现上, 当代历史小说和影视似乎也与传统历史艺术不同, 它们更多的是捕捉历史的‘暗角’, 展现出一些新的趋势: 从传统的‘正史’走向‘野史’、‘杂史’, 出现了大量以娱乐消遣为主的游戏历史之作, 如《康熙微服私访》、《风流才子纪晓岚》、《宰相刘罗锅》等, 当然与港台的‘搞笑’历史剧又有不同; 从‘大历史’到‘小历史’, 从‘民族寓言’到‘家族寓言’, 以家庭或家族的悲欢离合来折射整个时代与民族国家的变迁, 如《大

- 电视剧<花开有声>观后感
- 有感于DV十年
- 守望纪录片的精神家园
- 浅析“韩剧”缓慢艺术
- 电影接触情况与评价
- 电视专题片的思维方式
- 电视专题片的节奏把握
- <京华烟云>收视率缘何低
- 获奖纪录片创作十种方式
- 纪实形式的多样化
- “DV乌托邦”的幻灭
- DV物语
- 春节, 争夺收视闹荧屏
- “以点论价”掂谈
- 《天下无贼》的叙事策...
- 聚焦西部历史电视剧
- 杂说电视与戏剧

宅门》、《激情燃烧的岁月》等；从‘革命史’、‘政治史’走向‘生活史’、‘情感史’，通过更加个人化的生活经历与情感波折来表现历史的政治斗争和道德冲突，如《大明宫词》、《大唐情史》、《红顶商人》等，消费主义与商业价值成为历史的卖点；从‘整体化’、‘明晰化’走向‘碎片化’、‘争议化’，将历史的波澜壮阔的宏大运动通过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来展示，而且历史观念充满矛盾性，戏剧冲突更为尖锐，如《曾国藩》、《天下粮仓》、《钱王》等；当然，更多的是综合了多种表现手法的鸿篇巨制，如《走向共和》、《雍正王朝》、《太平天国》等等。总之，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和历史‘偶然’浮出暗角，给人们展示了一个个更加丰满的历史形象，虽然存在矫枉过正的倾向。

通过这些创作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近年历史剧在历史观上愈来愈倾向于相对化与多元化。大陆以往的历史观受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影响较深，人们往往天真地相信历史只有单一的趋势，受某种必然的意志所支配，历史可以截然地分成黑白分明的二元辩证的世界，因此，历史人物只有样板化的忠与奸、善与恶、美与丑的非此即彼的对立。现在人们开始向一元论历史观念的反面极端发展，许多人相信‘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者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¹‘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权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释。……历史虽然没有目的，但我们能把这些目的加在上面；历史虽然没有意义，但我们能给它意义。’²在近年的历史性艺术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这种‘重写历史’的强烈冲动，一种对历史惯性的拒斥，对那些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及其它符码进行破解、修正和削弱，通过发现甚至‘发明’一些‘历史主旋律’之外的零散插曲、佚闻趣事、偶然事件、意外情境乃至不可思议的情节进行渲染表现，这些想像具有民间化、边缘化、零散化和暧昧化的特点。当然这些倾向颇为适应当下的趣味，这是一个相对主义盛行，人们都愿享乐而不愿过于严肃负责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可以诞生多维历史观念的时代，但这种多维历史观少了自由与公正的庄严，多了商业与逃避的游戏，正如电视剧《雍正王朝》的主题歌所唱，‘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

二 ‘历史真实’与历史阐释权的争夺

艺术化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不能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责备艺术想像的‘不真实’甚至‘错误’。诗人和历史学家都企图重建史实，阐释历史，但历史的书写常常被控制在不同的权力之中，这使得历史往往存在于真实与假象、确定性与可能性之间，所以，鲁迅先生说少看正史，多读一些野史，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可信，而钱钟书先生则认为正史野史皆不可信。当今电视剧的‘历史真实’问题的争论，实质是历史阐释权的争夺。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艺术化的历史是不可信的，但是，艺术化的历史未必不是一种历史的发现，它用想像的方式补充了历史编撰的许多不足。诗人要在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之外去捕捉历史的‘偶然性’，要在历史的‘陈见’与‘定论’中寻找‘意外’，要在历史学家的‘盲见’中获得‘洞明’。历史学家犹如一束光，他‘洞见’历史的某些局部，却留下了无数黑暗的未知空间，诗人则诱发人们通过想像去填充这些空间，使之鲜活明亮起来。所以，艺术可以完成历史著作难以完成的工作，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经有个著名的论断，‘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诗人关注‘可能性’（possible）和‘或然性’（probable），‘可信的不可能性比不可信的可能性更为可取。’³用钱钟书先生的话说，历史考据只抓住表面的迹象，这是它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甚至穿凿附会；而艺术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没有吐露的心理，这是其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像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⁴。历史学家只能根据文献考据对他笔下的人物事件作出表述，却无法充分再现人物行动背后的思想情感，不能说清人物行为的内在动因，而这正是诗人的使命，历史学家回答发生了甚么，而诗人可以回答为甚么发生，所以，狄德罗（Denis Diderot）说：‘比起历史学家来，戏剧家所展示的真实性较少而逼真性较多’。我们不必以超然的宏观历史架构去俯瞰历史文学与影视，历史文学和影视所能完成的可能恰恰是一般历史无

法再现的生活化、细节化、情景化的微观世界，从具体境遇出发的艺术化历史更能将我们带入历史的真实。当我们把自己设想为历史大潮中的一个角色时，历史失去了我们高高在上时所能感受到的自以为是的明了与清晰，历史的变幻莫测使得每一个个体陷入选择的困境，所以，说得清楚的历史往往并非真实的历史。艺术起源于‘模仿’，哲学起源于‘惊奇’，历史则起源于‘想像’，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是很有道理的。

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但对历史的理解与阐释却是无穷无尽的，人们总是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目的和立场来书写历史，因此，历史其实是在不断的被改写的历史中。历史剧应该容纳多种见解与看法，让历史的复杂性尽量展现出来。我们应该避免用一个绝对的尺度将丰富的历史概念化，这不符合历史本身，也不符合艺术的法则。衡量一个艺术作品的尺度有时就看它有多大的思想空间可以供人们去开掘，历史剧不是对历史下简单的结论，把今人的解决方案硬塞给古人，而是要释放历史阐释权，展现历史的无限可能性和丰富性，当然，目前我们的历史小说和剧作还远未能达到这一理想境界。

当今历史剧的争论不仅在学术与艺术创造之间，也在商业效果与社会责任之间，甚至还可能引发不同意识形态观念的权力争夺，在这些纠缠中‘历史事实’始终不过是一个借口。从人们关注的中心话题来看，主要集中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上。商业主义的渗透使得许多作品加入了更多的传奇性、情感性和故事性因素，如《天下粮仓》在情感的力度上达到了‘震撼人心’的地步，但正是这种过度的煽情使得作品在悲剧的成因，即这场灾难发生的历史性、制度性原因的挖掘上虚晃了一枪。商业与消费逻辑过多地‘发明历史’，往往使现代人在历史的‘怀旧’中失去‘真实的历史’。历史不过是现实的‘过去投射’⁵：

‘现在’一旦成为‘过去’，便需要‘历史’来加以重新构造。而‘客观精神’却无法凝视、观察以至于重组这过去的支离破碎的历史；它所能大约感应到的，只是柏拉图洞穴里的虚幻映像……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己对历史所感应到的‘大众’形象和‘模拟体’而掌握历史，而那‘历史’本身却始终遥不可及。

三 激情燃烧的现代化意志

‘历史永远有，而人们对历史的警觉并不常有。’何兆武先生的隐忧是值得重视的。在想像历史的方式中常常可以折射出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与认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了历史的基本写照。关注历史、思考历史是人类前进的基础，宗白华先生说得好，‘历史上向前一步的进展，往往是伴随着向后一步的探本求源’⁶。历史探索是理解自身的最好的方式，尽管这并不能改变历史。美国历史学家凯利（Donald R. Kelly）说：‘历史在本质上是对人类环境无休止的探询’⁷，这种探询表现了人类对自身之迷的无限追索。

近年对晚清历史表现的热潮暗含了我们这个时代与晚清历史境遇的许多契合之处，不是说我们这个时代与晚清完全相似，而是我们也面临着一个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如何把握住历史的机遇，使正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中国获得更大的发展是这一代国人的历史使命与想像基础。晚清人的选择与探询无疑是当今国人的前者之鉴，正是基于此，他们在这些小说与影视作品获得了强烈的共鸣。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代历史艺术所折射出来的某些历史意识和观念值得我们反思，其中充满了许多思想和认识上的误区，其中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过多地从历史的结果和目的来衡量历史的过程，从而导致我们可能以工具理性的标准来掩盖历史的教训和问题。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出一个共同的倾向，只要目的合理，手段的合理性可以不管，这种马基亚维里主义——‘目的证明手段正当’的看法隐含着我们对历史的歪曲，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普遍性问题——过于地急功近利和工具理性化。在此，我们也看到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的狡计’阴魂未散，历史由看不见的无形之手所推动或者说由‘恶’推动，历史过程最终是一个合理的（rational）、理性的（reasonable）进程，一个进步的进程。为了人类最终从‘自由王国’走向‘必然王国’这一目的，人类在这一过程中的一切灾难、不幸和代价都是必要的、值得的。‘发展就是硬道理’是中国近现代史血的教训的总结，

不发展就要挨打，不发展就意味着亡国与动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落入发展主义这种历史目的论中，用单一的历史意志与愿望来衡量历史，似乎只要发展了，目的达到了，就可以不择手段，不问后果。所以，我们看到对雍正的评价就是，只要他呕心沥血为大清王朝走向鼎盛奠定的基础，其它的一切都不可以不管，不管其手段是否凶残，不管他对知识分子的禁锢到了何种程度……虽然，‘恶’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但这并不能作为对其罪责的合法化解释和宽恕。同样，我们对慈禧、李鸿章、袁世凯、洪秀全等人的评价都不能如此，个人无法担当历史的责任，然而个人也不能因‘历史原因’而开脱自己的责任，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就在于他能担当历史的责任。

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将那种只问目的不问后果和手段的社会行为叫做‘信念伦理’，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这种行为往往在‘美好的理想’或‘善的意志’中制造恶果，却让‘上帝’或‘历史’去承担这罪恶的责任，所以，‘信念伦理’不过是‘陶醉在浪漫主义的轰动中’的‘银样蜡枪头’。信念伦理与极权主义、霸权主义往往互为表里，未加检省的信念与理想常常使人陷入历史意志盲目冲动的不归路。西美尔（Georg Simmel）指出，目标为手段所遮蔽，是所有较高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和主要问题。8 韦伯说9：

正是在利用目的为手段辩护这个问题上，信念伦理必定会栽跟头。……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不断有这样的经历：信念伦理的信徒突然变成千年至福王国的先知。举例来说，那些一贯鼓吹‘以爱对抗暴力’的人，现在却在呼吁其追随者使用暴力——最后一次使用，为了达到一个一切暴力皆被消灭的境界。在每一次进攻之前，我们的军官也以这种方式对士兵说：‘这是最后一次，这次进攻将带来胜利，从而也带来和平。’信念伦理的信徒无法容忍这个世界在道德上的无理性。……即使在目的使手段圣洁化这个原则上做一些让步，也无法让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和谐共处，或是判断应当用哪一个目的来圣洁哪一个手段。

这个世界因为只问目的不问后果与手段所带来的罪恶正在不断地蔓延。黑格尔（Hegel）曾有一个比喻，代表‘时代精神’的伟人，在迈开他的历史巨人的步伐时，你不能计较他践踏了路边无辜的小草。集权主义为了‘民族的复兴’可以扼杀个人的权利与自由；霸权主义为了‘世界的和平’和‘人民的自由’可以向任意一个民族国家发动战争。在张艺谋的《英雄》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观念，当张艺谋以秦始皇苦心孤诣以‘合并天下’求‘天下太平’的‘英雄’壮举向布什主义献媚时，在奥斯卡上空手而归是必然的，好莱坞虽然需要‘战争’、‘暴力’来卖座，但他们有时也要‘反战’来卖座。张艺谋有点不识时务，这不是献媚，而是影射，对此他似乎没有搞明白。

当代历史小说与影视剧中隐含的这种历史意识是危险的，其背后潜藏着拿历史为现实开脱的动机。我们这两年在强烈地呼唤‘激情燃烧的……’，人们渴望回到那充满‘理想’与冲动的激情岁月，认为那是生命中最值得回忆与骄傲的历史。因为有激情有理想，我们就可以任性地宣泄我们的意志，践踏别人的尊严与自由。在激情燃烧的呼喊声中，我们似乎又感受到了‘红卫兵’的血液在今天中国人的内心涌动。也许，人们也会因为红卫兵有着美好的目的和革命的理想主义而为他们制造的后果和他们使用的一切手段辩护，难道因为是‘历史的意志’，个人无法左右历史，所以，他们就无须忏悔吗？只要我们最终控制住了SARS，目的达到了，我们就能为曾经犯过的过错找到开脱了吗？‘发展就是硬道理’，只要把庙搞富了，方丈贪点污，受点贿，养几个女人算甚么？只要经济繁荣，环境破坏与生态恶化也在所不惜。有些地方因为下岗职工太多，政府和人民说：‘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我们’，为了获得投资，为了经济建设，没有甚么是不可行的，‘有奶就是娘’嘛！现代化的欲求带来了中国的迅速发展，所以现代化目的论也正不断成为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强力意志。这种意志和我们曾经有过的‘共产主义’、‘大跃进’等等乌托邦冲动似乎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从《大宅门》的家族与民族的兴衰起落到《走向共和》的‘春天故事’（其主题曲之意），从《曾国藩》的悲壮选择到《太平天国》的腐朽自亡，从《康熙皇帝》的一统天下到《雍正王朝》的苦心经营，中国人在家国之间、民族与世界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存亡与富强之间燃烧着动人的激情，鼓荡这

激情的是难以阻挡的现代化意志。

结语：从‘历史进步论’、‘历史决定论’走向‘历史虚无论’

显然，我们的历史观未能摆脱历史决定论的阴影，甚至还在强化这种观念，我们不过是不满足于以往的历史决定论而已，我们渴望用新的历史意志来取代旧的历史意志，用发展主义的工具理性取价值理性，用现代化意志取代共产主义意志，用相对主义取代绝对主义，用多元历史观取代一元历史观，用否定善恶、是非、对错等的简单二元对立来否定善恶、是非与对错本身……这些冲动的背后都是以信念伦理为支柱，缺乏责任伦理的监护。现代性危机诞生于人类不断用‘发展’、‘进步’、‘新’等观念来取代‘传统’、‘古老’、‘旧’等观念时丧失了起码的‘好坏’、‘对错’、‘是非’、‘善恶’标准，一步步滑入到彻底的虚无主义之中¹⁰。这种‘现代性悖论’用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话说就是：‘我们越是培植起理性，也就越多地培植起虚无主义，我们也就越难以成为社会的忠诚一员。虚无主义不可避免的实际后果就是狂热的蒙昧主义’¹¹。我们从‘历史进步论’、‘历史决定论’最终滑向的却是‘历史虚无论’。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重写历史’的冲动，尤其是所谓的历史强盛时期，所以，中国人喜欢说‘盛世修史’。然而，‘盛世’的人往往并不理解历史时间的重量，他们容易用历史来粉饰现实，甚至逃避现实，所以‘盛世’常常隐含这更大的观念危机。相反，身处乱世的人往往更能看到历史的沉重，他们‘怀古’以‘悼今’，用历史来影射、批判现实，目的正是为了摆脱现实的困境，获得发展。个人存在于巨大的历史时空中，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历史的影响者，因此，每个人都有分享历史荣耀的权利，但有承担历史责任的义务。我们不应以结果来批判一切，‘不以成败论英雄’，但也不能以目的来为责任开脱。我们不能因‘翻案’而堕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失去了历史评价的基本原则。历史的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常常是相互发明的统一体！康德（Kant）说‘无规则就无理性’，对古人的片面评价，常常意味着对自我的迁就，对古人不公，其实就是对自己不公，不能让未来的人也以这样的方式来审视历史中的我们。

清代史学家赵翼悼杜甫有诗云：‘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历史的真实不是话语争夺的口实，而是坚实而明确的警世碑。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警省以甚么样的方式来想像我们的历史，毕竟，对历史的迷误必将影响我们对现实与未来的判断。‘在我们历史里横躺着我们未来的秘密’，这就是‘以古为鉴’的意义。然而，当我们为‘后现代’一切历史、世界与人都是‘断裂的’、‘偶然的’、‘残片的’、‘任意的’、‘嬉戏的’观念而欢呼雀跃时，历史已经不复存在，因为这样的历史对于现在与未来毫无价值。

注释

1 Karl R.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 Paul, 1957), 1.

2 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7), 2:259-60.

3 参见亚里士多德着，罗念生译：《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页28-30。

4 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页3-4。

5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张旭东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468-69。

6 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载氏着：《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页150。

7 凯利（Donald R. Kelley）着，陈恒、宋立宏译：《多面的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页2。

8 西美尔（Georg Simmel）着，顾仁明译：〈现代文化中的金钱〉，载刘小枫编：《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页10-11。

9 参见韦伯（Max Weber）着，冯克利译：〈以政治为业〉，载氏着：《学术与政治》（北

京：三联书店，1998），页105-117。

10 参见特劳斯（Leo Strauss）着：《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11 斯特劳斯（Leo Strauss）着，彭刚译：《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页6。

文章管理：肖克（共计 794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影视

- 广播影视的当代生存状况与文化建构功能 (2006-11-24)
- 从影视政策走向发现娱乐业的新力量 (2005-4-1)
- 双轨制：影视制作的法国模式 (2005-3-10)
- 影视剧也应警惕“拟态环境”的陷阱 (2005-2-22)
- 中国广播影视发展的战略思考 (2005-1-18)

>>更多

— 现代化意志的历史想像——对大陆近年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反思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码：

提交

重写

关于CDDC◆联系CDDC ◆投稿信箱◆ 会员注册◆版权声明◆ 隐私条款◆网站律师◆CDDC服务◆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